

# 抗战前后新启蒙思潮的“中国化” 转向及运行困境

庞虎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受特殊运行环境的激发,新启蒙思潮开启了由“西化”向“中国化”的转型尝试。然而,思想启蒙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它满足该国家需要的程度。由于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救国意义的过分迷恋和畸形阐发,新启蒙思潮没能形成对中国国情的全面把握,其“中国化”话语出现了批判意识与保守情结、“济天下”与“善其身”、文化包容与权威整合、民族觉醒与个性解放等关系的调处困境,最终在继承与超越、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博弈斗争中,左右摇摆、顾此失彼,没能形成对中国化进程的系统推动。当前,“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托民众主体力量,着眼于现实实践的主题变化,充分激发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超越对旧传统的过分纠葛,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创新前景。

**关键词:**抗战前后;新启蒙思潮;中国化;运行困境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3)01-0015-09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3.01.002

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长河的主流思潮,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近代以来,中国启蒙思潮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立足于民族危机的形势变化,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启蒙道路,到抗战前后,以新启蒙运动为代表,开启了“中国化”的转型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化”浪潮的冲击,但其暴露出的诸多矛盾纠葛,也给“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埋下了诸多隐忧,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 一、从“西化”到“中国化”:近代启蒙思潮的路向选择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呈现在面前的是两支相互交织的洪流:一是帝国主义勾结封建残余势力,试

收稿日期:2022-10-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史论”(20FDJA001);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儒化共产党’批判——基于建党以来‘儒化’思潮的意识形态审思”(21JDBN02YB);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意识形态制度研究”(2020XZA216)

**作者简介:**庞虎,男,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图陷中国于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的狂潮;二是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汇聚成巨大威力,不断发出保家卫国的吼声。由这一特殊历史情形所决定,近代中国启蒙可以说就是爱国主义文化运动的别称。启蒙者们无论是“中体西用”的倡导,还是“全盘西化”的号召,从其实质来看,都是致力于解决民族危亡问题。“先知先觉”的有识之士大多身兼两任,既是思想启蒙的倡导者也是救亡运动的切实推动者,民族矛盾的激化程度直接决定着启蒙运动的发展态势。

鸦片战争后,受外来因素的冲击,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革,旧势力的统治体系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受其影响,原有的文化秩序也产生相应变革。晚清新政对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新式学堂的创办,使大批读书人摆脱了“学而优则仕”的世俗观念,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辛亥革命的爆发进一步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促成了民众思想的初步解放;大批留学人员的回国,也进一步壮大了启蒙运动的主体力量。在此背景下,西方文化的传播得以迅猛发展,大批西学读物蜂拥而至,使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重大变革。人们开始抛弃“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从魏源的“师夷长技”,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再到梁启超的“世界主义国家”,最后发展为胡适的“全盘西化”,对西学的崇拜愈演愈烈,“西化”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话语。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诞生,为启蒙阵营注入了新的活力。自诞生伊始,马克思主义理论精英就一直以救亡启蒙为己任,秉承传统知识分子济世救民的爱国情结,高举马克思主义先进武器,力争在理论宣传、思想解放、革命动员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成为继林则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之后,活跃于近现代中国启蒙舞台的又一支新生力量。但受这一时期空前激烈的反传统倾向的影响,人们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外来文化缺乏必要的鉴别与取舍,一度造成思想界的较大混乱。随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式向世人摆出了引入式的启蒙能否解决中国问题这一亟待思考的现实性难题,形成了“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sup>[1]</sup>的初步共识。之后,历经马克思主义的“托派”化、教条化的阵痛,到抗战前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成为思想界争相讨论的显性话题。

新启蒙运动爆发于抗战前夕,是一场由中共文化人士发起的、吸引进步人士共同参加的思想文化运动。它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为号召,力图汇通中外,努力在西化与复古的不朽论争中独辟蹊径,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启蒙道路,在启蒙目标的现实化、启蒙武器的民族化、启蒙主体的大众化、启蒙态度的理性化等方面都实现了重要突破,并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行了可贵探索。1936年,新启蒙者陈唯实率先提出了“唯物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sup>[2]</sup>的主张。同年,陈伯达也认为理论工作者应该“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sup>[3]</sup>。1938年,艾思奇又进一步指出,过去只是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通俗化解释,还没有从整体上做到中国化,“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低级阶段,中国化现实化是它传播和发展的高级阶段,只有后者,才能既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深入地传播,又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从而产生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sup>[4]</sup>。并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途径等问题,作了初步解读。应该说,新启蒙运动的发动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五四”启蒙的历史缺陷,开启了中国化启蒙的崭新征程,也为随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论断,营造了思想氛围,提供了理论铺垫。

但另一方面,思想启蒙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它满足该国家需要的程度。20世纪30年代,世界格局重新调整,法西斯势力迅速崛起,特别是,此时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已被当年“一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侵华野心急剧膨胀。他们以“大东亚新秩序”的主宰者自居,对中国实行以“去中国化”为核心的文化摧残政策,极力排斥中华民族的文化影响,就连最初一度被奉为治华工具首选的儒家道统,此时也因“王道主义给予了因没有得到善待或失权而心怀不满的人兴起革命运动的动机”<sup>[5]</sup>,而被禁止传授。受此激发,启蒙运动的民族性趋向日渐显明,广大民众基于列强入侵的共同命运而形成的对本国民族

的认同感也更加高涨,客观上要求包括启蒙运动在内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民族救亡为中心,甚至连“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都被指责损害民族自信,不够中国人的样子”<sup>[6]12</sup>。同时,民族危机的高压,也使得中国的启蒙运动不可能拥有像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那样从容的步履,而总是仓促而就,很难形成持续的后继成效。这一形势,既在客观上促进了启蒙思潮的“中国化”转向,也为“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带来了诸多隐忧。

## 二、新启蒙语境下“中国化”转向的运行困境

伴随民族危机的恶化,新启蒙运动逐渐失去了五四时期自我批判的锐气,也不再拥有全面认识中国国情的余暇,而是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的救亡功能产生了过分依恋和畸形阐发,最终在继承与超越、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博弈斗争中,左右摇摆、顾此失彼,没能形成对中国化理论和实践的系统推动。

### (一) 批判意识与传统情结的纠葛

与近代知识分子一脉相承,新启蒙者的骨子里也曾有针砭时弊的内在冲动。面对抗战前夕思想文化界的复杂状况,1936年9月,陈伯达率先提出思想批判的紧迫性问题,认为:“中国的旧传统思想,一般地缺乏了有系统的深刻批评,而这种数千年来统治传统思想,目前,却正成为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用来奴役中国人意识的有力工具。”<sup>[3]</sup>艾思奇赞同陈伯达的见解,他在反思近代启蒙历史局限的基础上指出,过去的启蒙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封建落后的文化现状,启蒙运动积累下来的一些成果,后来也遭到了极大破坏:新的思想文化被视为“离经叛道”,已关门了的“孔家店”又再次开张,一些理论著作,充斥着神秘色彩,复古、尊孔等文化黑潮随着几年来国土的沦丧,又死灰复燃起来。对此,艾思奇指出,思想启蒙还任重道远,“需要现在的文化运动来完成它,这就是为什么在旧启蒙运动之外还要再来一个新启蒙运动”<sup>[7]</sup>。新启蒙者的这些倡导,既是对“五四”批判精神的延续继承,也是对当时国内文化现状的能动反应,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然而,随着运动的推进,新启蒙者的思想立场产生了明显动摇,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弱,妥协的成分逐渐增加。在新启蒙运动的倡导阶段,陈伯达等人基本遵循了较为革命的立场导向,力图引领民众“摆脱一切传统思想的镣铐,大无畏地从事批判一切”<sup>[8]</sup>;但运动正式开展后,这一立场很快变为“只要是对民族的生存有利益的话,就是对一部分封建势力携手,也是在所不惜”<sup>[9]</sup>;发展到高潮阶段,兆欧等人则进一步提出,思想批判的范围只能限于封建传统中“被敌人以及汉奸利用的那一方面”<sup>[10]</sup>,除此之外的其他内容都应予以保护;运动进入尾声,张申府等人甚至又把新启蒙运动与宣扬“四维八德”的新生活运动糅为一体,理由是,新生活运动提倡的“礼”与新启蒙运动所说的“理”是完全一致的,“礼者理也,‘礼’不过是把情理加以条理”,由此得出,“新生活运动与新启蒙运动在根本上不但是相通的而且是相同的”<sup>[11]40</sup>。新启蒙者的这一思想蜕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五四时期的某些激进倾向,但同时又事实上陷入了保守主义的泥潭。由此,新启蒙运动试图与封建复古运动相对立,但最终又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使以往启蒙运动大力批判的封建礼教又重新找回了合理化空间。

本来,批判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思想启蒙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中国化建构的必要动力。但受当时民族救亡环境的影响,新启蒙的倡导者们只能既顺从潮流又依恋传统,既要标新立异又缺乏足够勇气。正是由于新启蒙者缺乏坚定的政治立场,并掺杂了明显的调和色彩,致使他的启蒙倡导既不为革命者们所赞同,也不被旧势力所接纳,最终在激进和保守的左右摇摆中失去了变革创新的应有锐气。

### (二) “济天下”与“善其身”的脱节

受传统情结的影响,抗战时期,新启蒙倡导者们力图继续阐扬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传统使命,沿着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念,力图达成“内圣”与“外王”两大理想的交融糅合,既要潜心于思想研究和道德修炼,达成“独善其身”的文人境界,又不得不服务于民族救亡和国家复兴的现实大业,体现“兼济天下”的国民职责。面对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启蒙者们不约而同地宣扬思想启蒙的济世意义和文化人士的社会责任。陈伯达提出,大敌当前,世人应将一切私利都抛之脑后,必须“以‘治国’‘平天下’为‘修身’‘齐家’的出发点”<sup>[12]27</sup>。张申府、齐柏岩等人更是极力宣扬思想文化的社会意义,认为,“文化在社会一切活动中居于领导的地位”,文化人士应在民族救亡中“肩负起应该肩负的领导责任”,甚至通过新启蒙的发动,就“可以不但解放了中华民族,并且可以解放了全人类”<sup>[13]</sup>。“新启蒙运动的成功,也就是社会运动的完成”<sup>[14]</sup>。在当时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下,文化精英们仍能以“敢为天下师”的豪迈胸怀,扮演着社会教化、普济众生的特殊角色,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优良品质,就其精神而言,是值得称道的。

但另一方面,当时的客观现状又反映出,启蒙倡导者中想当精英的人过多,而真正的精英人士又实在是太少了。一些习惯于以“先知先觉者”自称的启蒙者们,在大张旗鼓地奔走呐喊、济世救国的同时,却严重忽视甚至刻意掩盖了自身的缺陷,淡化了对自我水平的反思。新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者仍以“圣贤”自喻,极力抬高文化精英的历史价值,陈伯达更是坚定地认为,“文化上的圣贤不但为我祖国河山生色,而且也正是我民族长存至今之重大的因素”,因为他们“都表现了最崇高的德行”<sup>[15]</sup>。但实际上,当时启蒙者的修养水平与“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之间存在相当的差距。新启蒙者并没有对中外文化形态进行细致的梳理与鉴别,更不可能实现他们所标榜的“创造中国的百科全书”的远大使命。同时,他们还缺乏团结各界人士将新启蒙运动贯彻到底的能力和勇气,只能坦言:该运动“只希望表现一个潮流,造成一种风气……志同道合者的集体,固所需要,但勉强凑合,劳民伤财,诚可不必”<sup>[11]41</sup>。还对突如其来的历史剧变缺乏足够的准备,对中国错综复杂的国情状况尚未深刻地解读,对广大民众的世俗愿望没有切实地关注,甚至还认为“最大的文化毁灭者,正是要从那衣食太丰足的人们中间去找,而衣食感到恐慌的人群,却往往是前进的生活和文化诞生的基础”<sup>[16]</sup>。并且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上,新启蒙者为了更广泛地动员民众,过分致力于通俗化的倡导,而相对降低了对情操水准的要求,认为“高尚的情操不一定是生艺术的胎”<sup>[17]</sup>。由此可见,精英们的思想认识并没有达到时代要求的高度,也就无法以超凡的文化魅力和高尚的人格形象去引导整个社会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

运动后期,张申府也意识到知识分子自身启蒙的同等重要性,认为,启蒙倡导者“实在应该自省、自我检讨,自我清算”<sup>[18]</sup>。但在当时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新启蒙者没有真正践行自我启蒙的使命,最终在自救与拯救的不和谐变奏中,知识精英们缺失了应有的感召力,包括“中国化”在内的一切呐喊也就显得底气不足,逐渐式微,没能赢得民众的广泛认同。

### (三) 权威淡化与文化联合的偏颇

新启蒙者对“善其身”的相对降低,使得他们无力树起自身的思想权威,更难以成为启蒙运动的领导核心。这一情形下,新启蒙者又走向另一极端:干脆以文化联合为名,直接淡化权威领导的实际意义。艾思奇认为:“启蒙运动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谁主导的问题,而在于运动本身的性质和任务的问题。”<sup>[7]</sup>陈伯达则排斥一切思想权威,认为:“思想应该从外来的权威独立起来,一切关于思想的外来镣铐都不应存在。”<sup>[19]</sup>何干之、柳湜等人也极力呼吁,“大家不必强求领导权,更不必作无谓的争夺”<sup>[20]241</sup>,新启蒙运动可以让人们抛弃对腐朽思想的迷恋,但“我们并不希望他盲目的来相信什么”,“不应提出什么思想的标准”<sup>[21]68</sup>。在新启蒙运动那里,权威已成了众矢之的。

但是,缺失了核心权威,所谓的文化联合也就变成了极其泛化的文化杂糅。柳湜直接将文化联合的原则界定为:“宽容,宽容,第三个还是宽容。”<sup>[21]74</sup>艾思奇等人更进一步对柳湜的“宽容”原则进行了

具体解读,认为,在抗战形势下,“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要素也好,封建的文化要素也好,不论是实验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只要你所发挥的是有用美点,都竭诚欢迎你到这运动中来”<sup>[22]</sup>;一切流派,只要能对抗战发挥一丝一毫的有用美点,就“不拘成见,不分畛域,不论新旧”,完全抛弃政治判断,他们“爱想什么就做什么,爱怎样想就怎样想”,这就是实现文化联合的“有效的途径”<sup>[23]</sup>。这样一来,“自由放任”成为这种文化联合的主要特征,以至于各联合对象自身的价值取向以及联合之后的主体关系、变化趋势等问题,新启蒙者并不涉及,也就削弱了文化联合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当时,艾思奇等新启蒙者实际上早已开始了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探索,并且提出了“解析唯物论”“动的逻辑”等一系列与马克思主义立场基本契合的创新见解。但是,新启蒙者的这些见解还主要是作为思想启蒙的武器工具之一,没能深入大众实践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更没有形成整合思想纷争的核心力量,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大打折扣,其现实价值也就难以发挥到应有的程度。

#### (四) 民族至上与人本关怀的失衡

在爱国联合的昭示下,新启蒙者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陈伯达指出:“启蒙思想不是别的,乃是救中国的思想。”<sup>[24]</sup>艾思奇也认为,以往思想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对内,是通过对内的改革来实现对外的解放,而当前只能走“爱国主义的一途”,爱国救亡在本质上“就是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而且是它的最高形态,是决定生死存亡的最高形态”<sup>[16]</sup>。何干之则在总结启蒙发展史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近代思想运动史“简直可以说是爱国主义文化史的别名”,“我们只有走上爱国主义的一途,此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sup>[20]230</sup>。于是,“爱国主义”成为新启蒙运动时期最响亮的战斗口号。

然而,民族的解放又离不开个体的支持,人本价值的关怀和个体诉求的尊重是民族动员的必要前提,“国群”与“小己”的和谐统一更是思想启蒙的应有追求。近代早期,严复就已提出过“国立为民”与“民生为国”的构想,指出:“谓国立所以为民,此重人道之说也;而谓民生所以为国,此重公义之说也。”<sup>[25]</sup>但他并没有找到衔接“人道”与“公义”的具体路径,最终还是以“民智愚昧”为由牺牲了“人道”的价值,因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五四”启蒙者效仿西方,大力倡导人本主义、个体价值,但又因为相对弱化了“国群”权威,很快就招来世人的批判。抗战前夕,面对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新启蒙倡导者又再次顾此失彼,在“民族至上”的强烈呼喊中,“小己”关怀被严重忽视。柳湜指出:“我们自己要不乱用一分力量除开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耻于浪费一分力量为自己个人。”<sup>[21]74</sup>艾思奇也把个人的诉求看作对民族利益的损害,认为一切社会民众都应消融自我诉求,不能保留个体的“余裕”,努力实现“无我的同一”<sup>[22]</sup>。陈伯达更是极力倡导:爱国人士有必要放弃职位,走上前线,直接融入战争,以此显示民族气节,勇于自我牺牲,因为评价国人是否具有爱国情操,就是“看其能否牺牲私意,牺牲小我”<sup>[12]15</sup>。

应该说,新启蒙运动把爱国作为首要宗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客观形势的要求,是对中国国情的本能反应,无疑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如果以此就将国族建构必不可少的“国”“己”两大元素对立起来,以“爱国”为由忽视“小己”的合理地位,就违背了思想启蒙的初衷,走向了新的思想桎梏。这样形成的救亡启蒙运动也因降低了自由民主的现实意义、缺失了“小己”利益的动力驱使,所谓“中国化”话语的倡导也就很难衍生出生动活泼的繁荣景象。

### 三、启蒙过后“中国化”话语建构的路径思考

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铸就了特殊的新启蒙思潮,既实现了对以往启蒙理论的某些超越,同时

又在儒学传统的过分迷恋下顾此失彼、自缚了手脚,“并未紧紧地把握住中国政治的脉动”<sup>[26]</sup>,最终在一片非议声中,仓促落幕。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的时代,新时代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已不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能比拟的,更不可能凭借一个儒家传统的复兴就能一蹴而就。习近平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sup>[27]</sup>。当前,我们应着眼于新的实践主题,探索切实可行的创新路径,才能超越对旧传统的过分纠葛,为新时代的“中国化”话语建构,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 (一) 马克思主义是促进中华传统创新发展的理论指南

不可否认,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精神传统,是中国元素和中国特色的典型体现。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是“中国化”话语建构的重要基石。但同时也要看到,儒学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既拥有基于社会延续性而形成的适应张力,更不可避免地含有历史惰性影响下的保守特质,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以及由此生成的阶级属性、功能取向等,都已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它的某些思想内容也早已过时,成为当今社会必须抛弃的封建糟粕。儒学自身的现代化,是发挥其当代价值的首要前提。

对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首先,马克思主义能够为儒学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吸收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sup>[28]</sup>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西方,但它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保证儒学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其次,马克思主义能够为儒学现代化提供方法支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就是立足中国国情,结合时代主题,扎根民众实践,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创新过程,是场域层面上的中国化、主体层面上的大众化与时间层面上的时代化三者密切结合、彼此促进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所造就的中国奇迹、开辟的中国道路、凝练的中国理论、表现出的中国话语都能为儒学现代化提供经验借鉴。同时,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与时俱进的革命属性,也能加速儒家传统的新陈代谢进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促进传统文化实现“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sup>[29]</sup>。

### (二) 民众立场是塑造话语权威的核心取向

“中国化”话语的建构,离不开精英的引导和民众的认同。以往特定的社会背景塑造了知识群体的独特历史权威,也成就了他们启蒙运动领导者的角色。由个体觉悟的非均衡性状况所决定,一定时期内,文化精英与普通民众的二元划分还将持续存在。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过早地消灭二者的区别,而是以大众化为导向构筑起主体之间交流互动的健康平台,促进文化精英自我启蒙与启蒙民众的协同共进。

当前,文化精英群体虽然仍在思想潮流、价值规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但他们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正在面临较大挑战。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文明程度的提升,新时代的社会民众已不再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而是正在逐步发展成追求进步、崇尚民主的新型主体。新形势下,文化精英们如果仍以“先知先觉者”自居,采用“填鸭”式的办法,向民众倾注一些看似“神圣”的思想教条,结果必然是收效甚微。当前,文化精英们应及时化解“救世主”心态。一是反映民众诉求,学习大众话语。文化精英们要深入群众,切实尊重民众的主体地位,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以民众的立场来认识民众、赢得民众。其中,生活性的语言是拉近与民众距离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指出:“语言的背后是感



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不会说话是表象,本质还是严重疏离群众,或是目中无人,对群众缺乏感情。”<sup>[30]</sup>空洞、喊口号式的“官腔”无法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对接,反而会激发群众的逆反情绪。在语言的运用方面,党的领袖早已做出了示范,毛泽东经常使用歇后语、谚语、成语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比如“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等;邓小平通过大白话来讲明大道理,比如“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等;习近平擅长运用隐喻来说明复杂的事物,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等。只有实现由政治话语向民间话语的转换,才能使理论深入人心,赢得群众。二是搭建互动平台,促进阶层流动。精英与民众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应时刻保持新陈代谢的运动状态,形成一个公平公正的“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上,一切‘选手’都获得平等的机会与权利”<sup>[31]</sup>。一方面,大力挖掘民众潜能,把尊重普通群众的思想权利放于重要位置,鼓励他们大胆思想、大胆探索,实现由被动启蒙者向先进思想的主动创造者和传播者的转换,并以宽广的胸襟积极扶持新生力量的成长,使“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sup>[32]</sup>,能够及时脱颖而出,为精英阶层注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作为文化正统的传承者和守护者的精英,也应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危机意识的驱动下加紧自我修养,优化知识结构,不断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因为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正带来现实世界的激烈变革,而“现实世界的激变会使某个思想体系突然被打乱,这种被打乱反过来又检验、确立或否定了某一社团思想家们的灵活适应性”<sup>[6]175</sup>。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精英及其思想,必将失去现实价值而遭到时代的淘汰。

### (三) 现实实践是走出思想纷争的根本途径

兼容并蓄是文化繁荣的主要标志,也是中国化进程的重要表征。这里的兼容并蓄,既不是各种不同思想的简单拼凑,也不是各类不同流派的任意纷争,“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应是以实践为导向的更高层次的思想整合。

回顾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任何一次思想运动都伴随着新旧思想观念的激烈交锋。从最初的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迷恋,到后来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认同,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每一步思想的发展都承载着向错误思想宣战的印记。但思想的建构绝不能停留在思想论争的层面,必须始终以现实实践为最终标准和归宿。革命救亡中遇到的重重困惑,归根结底要通过实践的推动来化解;改革探索中产生的种种分歧,归根结底也要依靠实践的成效来检验。实践才是新思想、新方案形成与确立的最终依据。离开现实实践来谈“中国化”的启蒙或建构,都只能是“面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在思想上的表现”<sup>[33]</sup>,不仅不能引领社会的进步,反而会阻碍思想发展的正常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人也抛出过所谓“新启蒙”的口号,但他们无视改革开放成果,抹黑社会主义实践,甚至还把很多脱离中国现实的主观臆想和极端诉求都打上了“思想解放”的名号,最终只能将中国引向歧途。近年来,又有一些人借助“儒学复兴”之机,极力宣扬“儒化中国”“儒化中国共产党”等主张,无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成就,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常建构。这种所谓的启蒙或者复兴,扭曲评判是非曲直的客观标准,必然造成思想界运行秩序的混乱。当前,“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必须立足并且服务于实践,既防止僵化保守倾向的滋长,又遏制极端激进思潮的蔓延,努力抵制各种“左”、右倾思想的干扰,确保“中国化”话语始终遵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

### (四) 制度优势是化解“群”“己”矛盾的坚实保障

“群”“己”关系问题一直是近代以来思想界争论不休的棘手话题,也是影响中国化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来审视二者的轻重,总是顾此失彼,把“国群”和“小己”推向水火不容的矛盾境地。五四时期过多效仿西方,大力倡导个性解放、激扬人的价值,但因弱化

国群的权威,很快就遭到了众多批判。而抗战前后的新启蒙思潮则在民族救亡的严峻形势下最终走向另一极端。

事实上,“国群”“小己”能否化对立为和谐,关键取决于国家性质的优劣和民主化程度的高低。在专制制度下,“国群”与“小己”的关系表现为针锋相对的生死对抗:对统治者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生为国”是不容争辩的绝对天条;而对被统治者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国立为民”才是理想的政治架构。显然,专制制度下的群己矛盾,已超脱了思想启蒙的界说,被打上了阶级属性的烙印,而演变为君、民之间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任何试图通过内部沟通来促成二者统一的努力都是徒劳。只有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规范下,国家才真正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才能伸张民权、反映民意、服务民生,达成“国群”与“小己”的统一。当前,中国化的推进及其话语的建构应积极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优化中国国族的制度内涵,促进国家制度优势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化,提升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自觉自愿地维护国群尊严、多做贡献,最终在执政者恪守“国立为民”、公众牢记“民生为国”的互动氛围中,实现“国群”与“小己”的和谐融通。

#### 参考文献:

- [1]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J].太平洋,1919(1):10-15.
- [2]陈唯实.通俗辩证法讲话[M].上海:新东方出版社,1936:7.
- [3]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J].读书生活,1936(9):24-26.
- [4]艾思奇.哲学的现状和任务[J].自由中国,1938(1):10-11.
- [5]千叶命吉.满洲王道思想批判[M].东京:大日本独创协会,1933:207.
- [6]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M].李国英,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 [7]艾思奇.论思想文化问题[J].认识月刊,1937(1):8-22.
- [8]陈伯达.真理的追求[M].上海:新知书店,1937:14.
- [9]艾思奇.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J].文化食粮,1937(1):40-44.
- [10]兆欧.五四和新启蒙运动[N].北平晨报,1937-05-04(1).
- [11]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M].上海:生活书店,1939.
- [12]陈伯达.新人生观的创造[M].上海:晨光书店,1940.
- [13]张申府.抗战一年的文化[J].战时文化,1938(4):1-2.
- [14]张申府,齐柏岩.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J].读书,1937(2):14-18.
- [15]陈伯达.在文化战线上[M].上海:生活书店,1939:23.
- [16]艾思奇.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J].现世界,1936(1):8-10.
- [17]艾思奇.新哲学论集[M].上海:读者书房,1936:102.
- [18]张申府.知识分子与新的文明[M]//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720.
- [19]陈伯达.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再论新启蒙运动[J].认识月刊,1937(1):23-34.
- [20]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M].上海:生活书店,1937.
- [21]柳湜.国难与文化[M].上海:黑白丛书社,1937.
- [22]艾思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J].生活星期刊,1936(19):5-6.
- [23]夏征农.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M].上海:一般书店,1937:43.
- [24]陈伯达.思想无罪[J].读书,1937(3):16-19.
- [25]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315.
- [26]江凌.开展中国新文化运动[J].国际知识,1937(1):60-65.
- [27]新华社.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J].求是,2017



(15):3-5.

- [28] 习近平. 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在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J]. 学习与研究,2009(12):14-22.
- [2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
- [30]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46.
- [31] 胡绳. 胡绳文集[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74.
- [32]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9.
- [3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7.

## Transformation and Running Dilemma of “Sinicization” in New Enlightenment Thoughts around the Anti-Japanese War

PANG Hu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Inspired by the special environment of national salvation, the trend of New Enlightenment Thoughts changed from Westernization to Sinicization. However, the realization of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always depends on the extent to which i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country. Because of the excessive infatuation and abnorm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especially the traditional meaning of saving the nation of Confucianism, the new enlightenment trend of thought failed to form a comprehensive grasp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In its “sinicization” discourse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conservative complex appeared, together with “helping the world” and “being good”, cultural inclusion and authority integration, national awakening and personality liberation, and finally in a series of games and struggles between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has not been promoted systematically due to swaying from side to side and neglecting one thing and losing the other. At pres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localization in China” should rely on the main force of the people, focus on the theme change of practical practic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so as to transcend the excessive entanglement with the old tradition and open up a broader innovation prospect.

**Key words:** around the Anti-Japanese War; New Enlightenment Thoughts; sinicization; running dilemma



(责任编辑 洪小秋 张伟)